

湖北省

湖北省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全國鄉土教材叢刊第一輯

湖北省

全一冊 實價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劉振東

編輯者 程其保
王鏡清

發行者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

重慶南溫泉白鶴林

版權
必究
翻印

序

所謂鄉土教材，非新物也，蓋遠在十四世紀之中葉，意大利教育家佛特爾(Dr. Felire)即創設兒童「快樂之宅」以兒童最切近之教材，為教學之起點。其後有可米里雅士(Comenius)之主直觀教學，盧梭(Rousseau)之主個己活動，裴斯泰若其(Pestalozzi)之主實物教學，至沙自曼(Salman)乃注重兒童之旅行與採集，於是正確形成所謂鄉土地理，鄉土歷史等科。

近代教材之編制，不外兩個方式，一即所謂論理之方式，一即所謂心理之方式。論理之方式，係依教材本身之次序編制之，其着重點在邏輯，故歷史之教材，必自上古溯中古而至近代；地理之教材，必自天文，而五洲，而本國，以至本鄉本土。心理之方式，係以兒童了解能力之發展次序編制之，其着重點，在所謂統覺主義，故一切教材，無不以兒童所能觀察之切近鄉土環境為出發點，然後由近及遠，由淺入深，其領悟自更深刻。近代教育理論之中心，既皆以兒童為本位，於是乎鄉土教材之編制，遂成為今日一般學校最主要之工作。

但此種鄉土觀念，只不過代表教材編制之一種手段而已。及至斯百命格(Sprangle)更以此種觀念，擴而大之，由手段轉而為教學上之一理想，乃至於認為教育之整個目標；換言之，向之以為教學之手段者，今則以鄉土為對象，從而構成整個的鄉土體念矣。

所謂鄉土體念，實包括感情，意欲與認識三個因素。此三個因素，混合成為一體，乃得發生精神之作用，精神作用，既產生矣，小之可以引啓愛鄉愛族之心理，大之可推及之于愛國家，愛人類之觀念，是以鄉土教學，在今日之教育設施中，佔有重要地位，足以影響整個教學方法與課程轉移教育之重心者，孰是故也。

鄉土情感之產生何自乎？曰由於自我與環境之得以調協。大凡吾人生長於周知之事物及習見之活動中，恆能發生一種「安心」，因能安心，遂生好感。是好感生於調協，調協愈密，情感愈深。鄉土意欲之產生何自乎？曰由於情感，而生關切；關切愈深，而擁護鄉土價值之心理亦愈厚。故凡鄉土之事物，其有利害，無不盡力以圖之，其有害者，亦無不共赴以祛之。情感與意欲，打成一片，所謂愛鄉心理，即隨之而生矣。鄉土認識之產生何自乎？曰此乃情感與意欲相結合自然之結果。此種認識，恆由個別事實，而進於聯聯的認識。是以吾人

對於他鄉之事象，雖能洞悉其中之個別情形，而究不能綜合得全體之認識。所以客居他鄉恆不免作奇異之感想者即基於此。

由是以觀，鄉土教學，非易事也。一般學校，間有設置鄉土科或編訂鄉土教材者，用意自屬正當，但其流弊，往往偏重于智識之傳達，而忽于情意之陶冶，故所謂鄉土體念之原則，終未獲實現。近世批評鄉教之人，恆恐此種教學，易陷于狹小之愛鄉心，有礙于廣大愛國心之發展，是未明鄉教之真諦有以致之也。

今看鄉土教學之在我國，正當萌芽之際，得中央熱烈之提倡，其有裨于教育之前途，正未可限量，茲與鏡清先生就二十六年所搜集之資料，從事整理與編製，共得百餘萬言，先為付印。對於各地陸續送來之資料，擬歸入鄉土教材叢刊第二輯現在所得結果。雖與預期相距實遠，亦聊足以符中央提倡之旨，而藉為全國之參考耳。至於材料之搜集，前本部同事經筱川先生曾有相當貢獻。全叢書編完之後，又由本部同人王孟鄰朱建民錢安毅潘學德姜季辛王啓華馬大英隋玲夫陸東亞焦如橋劉炳炎等先生分門別類，校閱原稿；而本叢書原始資料，大半賴各地方之縣長，縣教育科長，中心小學校長，或民衆教育館長之熱心擔任通訊，均於此

合併申謝。

恐其保 王鏡清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於重慶南泉

緒言

我們實施鄉土教育的呼聲，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原不自今日始，惟迄今無成效可言，值此抗戰建國的大時代到來，對於鄉土教育的實施，益覺格外的迫切了。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決議：『……尤宜儘先編輯中小學公民，國文，史地等教科書及各地鄉土教材，以堅定愛國愛鄉之觀念。』而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亦通過二十一人之提案，其修正案云：『爲持久抗戰，在教育方面，宜注重鄉土歷史地理人物詩及民族先烈事蹟，以期提高民族意識。』教育部並規定縣立初中學生亦須注重鄉土教材云；『應特別注重公民常識之灌輸，生產勞動之訓練，以及本縣鄉土教材之講授，使其愛國而同時愛鄉。』（各級教育實施方案）這是鄉土教材在抗戰發生之後，被各方面重視的事實，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了。

鄉土教材的範圍，因鄉土的涵義，與兒童的學年，而有廣狹之分。實際上說起來，一個兒童的本鄉本地謂之鄉土，一個兒童的本縣謂之鄉土，一個兒童的本省也可以謂之鄉土。兒童是鄉土教材的中心，鄉土教材好比一個繼續不停向外擴大的圈子，兒童的經驗愈多，學年

愈高，則圈子愈逐漸向外擴大，由兒童最近的環境（學校與家庭）擴至鄉親的環境（城市或全鄉），和更遠的環境（全縣以至於全省），最後乃至於全國。這是由近而遠，由淺而深，不僅適合兒童的學習心理，抑且適合抗戰建國的需要，因為兒童有了豐富的鄉土知識與經驗，茲一種同化作用，觸類旁通，由愛鄉而知道愛國了。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鄉土教材就是一切教材之「本」，愛鄉土乃是愛國家之「始」；不是要提倡封建思想的復活，乃是要使我們抗戰建國的教育有更堅實的基礎。也就是說，如使兒童對於鄉土有正確的認識，必易使其進而對於民族有正確的認識，如能使兒童有真正的愛鄉土的精神，必易使其進而有愛國家的精神，因為鄉土與國家民族的關係，原屬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或互相依存的關係，斷沒有國家民族亡了，而鄉土與個人尚可保持光榮的生存的道理。

鄉土歷史是活的歷史 歷史本應該是活的，只因教材選擇不善，教法不良，對於人類極有教育價值的歷史，往往變成乾燥無味，一種毫無生氣的材料，不但兒童不愛讀，恐怕就是我們成人，有時也提不起興味來去學習歷史，鑑賞歷史，運用歷史以解釋現在，預斷將來。

但是歷史是一種研究過去人類事實的學問，凡屬現已不存在無法直接觀察的事實均屬歷史的事實。歷史的事實與因果關係雖爲吾人所不能復見，但爲吾人所必需，以爲指示吾人生活之明燈。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白特勒先生說：『當一個人自稱不受過去羈絆所拘束的時候，他宜布他自己的愚笨，而且假使他能辦的時候，他一定要將他自己減少到下等動物的知識平面爲止。……聰明的人，就相反了，他一定會在過去的記載中尋出他們的教訓，使得他自己不至於再做什麼已經證明是無用的，虛費的，或者錯誤的。有學問的而且真正的歷史的說明，應該將歷史當作人類社會的，道德的，同知識的教育的記載，……』（註一）清代史學家章學誠云：『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義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論以爲學也，雖采以爲才也，鑒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職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見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

烏乎可哉？』（註二）此東西兩大名儒對於史學所見略同。蓋歷史所以教訓人者，乃因良史家將過去純粹的客觀事實記載下來，可以供吾人解決現今實際問題的參考耳。歷史的材料如可以孤立自存，不能與現今的社會生活上之實際問題發生密切的關係，則歷史的活力（The vitality of history）即已喪失。約翰杜威教授在他著名的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一書上說：『過去的事情如僅視為過去，則過去的事情就不復有值得吾人注意的必要。假使過去完全成了過去，與吾人的現在不生任何關係，那麼我們對付他只有一種合理的態度，就是聽任這種死的過去去埋葬其自己。但是過去的知識是了解現今的鎖鑰。歷史所論述的雖是過去，但是這個過去就是現今的歷史。』（註三）前德國國防總長，白龍培元帥說：『一切既往的研究，如果不切於現在及將來的事實，是沒有用的。』（註四）利用良史家的歷史，使學生容易學習，樂於學習，養成其讀史的習慣與判斷力，使其鑑往以知來，援古以證今，會通得失，創造偉業，乃史學教師之責，因為任何好的歷史，在兒童的眼光看來，固無所謂死活，全恃教師的循循善誘。如將發生於千百年以前的事，教授生徒時，不從當時的與當地的情況指明彼此互相連絡的地方，強以之為教授之資料，不惟不經濟，抑且使兒童的頭腦為

此等死的，零碎的事實所纏繞。而不能領悟。爲兒童所不能領悟，且不能消化的歷史，就不是活的歷史。鄉土歷史，是就學生當地的現實的情境入手，使其先注意本鄉本土的歷史，以便逐漸學習距離兒童較遠的歷史，而這種歷史，就兒童的觀點看來，比較易學易懂，既親切，又生動，以此爲起點，爲基礎，再學習其他各種應學的歷史。而當地的歷史上的物質的遺蹟，更容易使過去變成爲一幕「宛然在目」「栩栩若生」的活的戲劇。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歷史教授 Henry Johnson 先生的一段話，就是歷史教學應從鄉土教起，而鄉土歷史就是活的歷史一個有力的說明。他說：「無論我們對於歷史的觀念如何，無論我們對於講授歷史的目的何在，我們要想在教室中使歷史成爲有效力的科目，重要的條件就是要使歷史帶有一種真實的空氣。……對於真實的感覺，最有力的方法當然是真實的本身。格林 (John Richard Green) 在他的諾曼底 (Normandy) 同諾曼底的人開宗明義章裏面說：「我們走過了諾曼底使我們對於我們歷史的時代比世界上所有書籍還要明白」「走過了諾曼底」是少數人的特權，但是走過了一部份諾曼底是人人可能的。各地方至少供給一個地方的本身，本地的環境，本地的遺跡，同本地的習慣。無論什麼地方總有材料預備在那裏使本地的過去成爲真

的。雖然一個地方可以對於一般世界並沒有遇到重要的事情，……但是所有同人類生活有關係的地方可以說統是歷史的地方。所有人類藝術同工業的出產品就是歷史的出產品。所有人類的習慣統是歷史的習慣。名譽的放射不是一個地方重要與否唯一的標準，甚至不是世界史的重要標準，無論那個地方的過去好好的使他成為真實了，不但對於研究較大的過去的真實有一種感情上的貢獻，而且能够供給特種的元素，為重新建設較大的過去的材料。這不但是一各地方的教師同學生應該知道各地方的過去同現在唯一的理由，而且是一個充分的理由。」

（註五）

杜威教授分學生宜學的歷史為下列數類；

（一）傳記歷史 兒童之學習歷史最好由關於個人的傳記起首，因為個人的傳記，能使本是抽象的，不易領會的歷史事實，變成具體的，生動的歷史。

（二）原人歷史 此法在美國小學中應用最廣。原人歷史的教育價值，即在其能幫助吾人明白關於社會進化之歷史，因原人的簡單生活，可逐漸的誘導兒童使其明白複雜的生活，明白人類演進之途徑，而不致於感覺艱難難懂。

(三) 政治或軍事歷史 在中小學中欲養成忠誠愛國的國民可以之爲教育宗旨之基本。

(四) 經濟或實業歷史 此類歷史，係論述人類物質之生活。一方面能使我們獲得許多前後相接的人類發明上的知識，明白我們社會進步的前後相接的原因。另一方面使我們明白，我們每個人所必須做的一件事是求生存，每個社會所必須做的一件事是使每人對於公共的福利，都有相當的貢獻，並注意使每人從社會得到公平的報酬。

(五) 智能歷史(Intellectual history)即學術史或文明史等。照杜威的說法，增進人類幸福的英雄，並不是政治家，並不是將軍，也並不是外交家，乃是科學的發現者與發明家，乃是藝術家與詩人。科學的發現者與發明家給人種種工具，使人藉以擴充他們的經驗，藉以主宰他們的經驗。藝術家與詩人能把人的奮鬥，凱旋，與失敗，用圖畫，雕刻或文字來描寫顯揚，因此使得他們的意義能普遍的傳播與別人。(註六)上述的(一)(二)(三)(四)(五)項歷史，在我們這個有五千年歷史的國家裏，任何縣都有其歷史上的遺跡——無論是文字記載下來的或物質方面的，供吾人之珍愛與發揚！在國內的許多地方，甚至也可以實際看見原人式的生活。從鄉土環境起學習歷史，以明瞭我們在「時間」上的生活狀態，最能使我們

得到一種真實的空氣，使我們一方面興奮，懷念過去的偉烈事蹟，一方面反省，明白我們尚有一部分同胞在時間上是落後了千百年！陳立夫先生說：『要培養民族的自信力，第一件事要使人人都知道我們的歷史，以光榮事蹟激發前進之信心，以恥辱事蹟激發改過之勇氣。過去無數的偉烈事實和學術發明，最起碼的要求是要讓受教育的人完全都能了解，使每一縣的人民知一縣之歷史，……這些史料應如何搜集整理與編製，以期從根救起，我們要趕快從事研究，一點再也不能忽略了。』（註七）這幾句話，切合時代的要求！

鄉土歷史教材的目的在復活國魂「從根救起」，這是一句一針見血的話。這座巨偉的老樹——中華民族——經過了無數次的狂風暴雨而今日猶能屹立自存，自有其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這個大民族的軀幹雖枯萎，枝葉雖殘落，但樹根確仍有活力，這個有活力的根、正在發生新的枝幹。所以「從根救起」，不僅是必要，事實上也是可能的。我們希望呼吸着臘梅樹花的清香，而忘記了培養牠的老根，甚至於討厭那臭腐的肥料，是不可能的。我們民族的根，就是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魂者，身之精也」（註八）個人如此，國族亦然。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簡單些說，就是國魂。復活國魂，就是要恢復固有的民族精神，並

從固有的民族精神上發出新的嫩枝，結出新鮮果實，而不是舊的禮教與一切不合時代的道德形式之復活。因為形式是一事，精神又是一事，形式應隨時代的要求而改變，而精神因時代的變遷應格外發揚。以具有四千餘年的歷史與富於自尊性獨立性創造性與堅苦卓絕精神的中華民族，到了這個風電交加的時候，是會自然的發揮其戰勝艱難的本能，散出一種臘梅花幽香的。西哲嘗以 *Conquer and Endurance* 兩字爲中國民族的特性，我覺得是適當的。何況有偉大的人類的導師 孫中山先生已播下復興的種子，至於國魂的發揚，那就是我們的責任了。發揚國魂的方法自然很多，但歷史，尤其是鄉土歷史的教學，尤爲切要。因為鄉土歷史最富於影響生徒實際做人的可能性。所以今後的歷史教學應以鄉土歷史爲教授本國通史的起點，而世界史的教學又應以本國史爲中心，不可以再像過去給兒童以零碎片段的各種歷史的死知識，要兒童囫圇吞棗的咽下去。鄉土歷史，對於愈缺知識與經驗的兒童愈重要，各地方的兒童應先從各自的鄉土歷史起，範圍逐漸擴大。各地方的歷史變活了，有人講了，有人學了，則帶全國性的歷史也就變活了，就不致徒成爲一種供學生過考試得文憑，混飯吃的八股了。這不是說，因為鄉土歷史是利川學生自己的環境來做歷史的起點，我們講授歷史就

只應該始終由近而遠，但是我們亦可以由遠而近，最重要的關鍵在：無論由近而遠，或由遠而近，總要所講的歷史的事實與現今的實際的問題發生關係。所以杜威說：『運用歷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講授歷史，若認為現今的社會情況難與過去分開是唯一的真理，那才算一面的見解。同時這種方法的另一面就是過去也難與我們的活的現在分開，仍能保持其意義。歷史的真正的出發點，總是從一些活的現在的情境開始。』（註九）

然而鄉土歷史教材之所以能復活國魂，是超越了糾紛不已的一般的历史的目的論，而有其自身的適合我們國家需要的至上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是鄉土教材的選擇，一方面是教者具有歷史的才學識德與愛國熱情，然後纔能造成一個足以達到目的的教育過程。也就是說，教材要選擇得適合目的的需要，教師要能善用教材，循循善誘，且以身教。所以龐錫爾（F. G. Bonser）教授說：『歷史之事實，如選擇得當，則能昭示吾人以各種足資模楷之性質：如「忠誠」，「愛國」，「篤實」，「貞固」，「公平」，「雅量」，及「勤勉從公」之精神。古人佳美之性情，足以喚起後人向慕之心，而足以影響其言行舉止。……從人類歷史之記載中，教師應擇其能增進永久幸福之活動而善用之。』（註十）但杜威教授說